

小凤仙是“名妓”、“侠妓”吗？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如何评价此时的小凤仙？蒋介石与张学良延安年为何双双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张学良既然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又何以不抛售公有的迫切愿望？再拖延东北易帜的时间？他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只有协调和配合，而没有矛盾和争夺吗？张学良在争夺什么？蒋介石心有何隐情？蒋介石除了政治、经济等优势外，是否也有军事谋略方面的？国民党一制共军哪一方不如共产党？孙中山记述的哪些历史事件是正确的？谁造了孙中山的“假死”？孙中山为什么会破格录用洪秀全的后人？本书依据史实，认真回答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新编古调

Historical Events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Beyond

曾业英 ◎著



民国史事及其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古调新弹

民国史事及其他

曾业英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 / 曾业英著

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 / 曾业英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97-1799-8

I. ①古… II. ①曾… III. ①中国－现代史－民国－文集 IV. ①K25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114 号

古调新弹

——民国史事及其他

著 者 / 曾业英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王新明 王静连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7.75

字 数 / 629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799-8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屈指算来，我忝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近 50 个寒暑，却未能拿出多少像样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从以往发表的为数寥寥的旧作中，选出 37 篇，外加一篇附录，结成这个集子，供识者一笑。

我出生在江西于都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儿时听母亲不无内疚地说过：为了让孩子“学点文化，不受欺侮”，他们也曾咬牙送我大哥去读书，但没读几年就叫停了。原因是需要大哥那双孱弱细嫩的小手，协助父亲养活我们几个弟妹。由于大哥又哭又闹，死活不肯就范，母亲竟将他所有的书本作业，连同书包一起投进厨房的灶里，让大火化成了灰烬。大哥没了那些书本作业，才死了读书的心。

我是幸运的，1949 年 8 月 13 日，不到 9 岁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一个团攻占了我的家乡于都县城。这年冬天，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家里分到了田地，从此不用再为上学发愁，大哥的悲剧自然也就没有再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一路由村镇小学升入县城初中，再到赣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在当年蒋经国所办中华儿童新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点高中。1958 年 7 月，又顺利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成了村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1963 年 7 月，依靠国家提供的“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随即分配到了当时令人向往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但是，幸运中也夹杂着几许不幸。自大学时代起，就政治运动不断，少有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候。我一进大学校门，就赶上大炼钢铁，“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等运动。一年级基本没上课，五年大学，实际只读了四年。来到近代史所后，先是下乡“劳动实习”，继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年复一年，无休无止。“思想改造”成了必修的主课，本职读书研究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业余选修课。紧随其后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眼看孔子说的“不惑之年”就要到了，可学问之事，还没真正动

手摸过。人生中的十五六个最佳年华，就这样白白流逝，难道还不是不幸？

不过，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国家改革开放，全力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各行各业从此走上了发展的正道。打那以后，政治挂帅的年月终于远去，我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从事渴望已久的读书研究工作了。虽然此后又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冲击，但它毕竟存在一定的可控性，而且影响也因人而异，与此前强制实行的覆盖一切的政治运动大不相同。因此，就我总的人生道路而言，不幸终归结束了，应该说还是幸运的。

所谓幸运与不幸，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经历，绝非我个人所独有。个人固然可以通过追求、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说到底，关键的因素还在时代，没有时代提供的必要条件，个人哪有用武之地？唯有时代提供了这样的用武之地，个人的努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分出个人成就的大小与高低。所以，较之时代，个人努力永远是第二位的，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任何岗位，莫不如此。我无意于以此为自己的不才和懈怠辩解，只是想说，纵然如此，我的今天也是时代所赐。对于过去，我无怨无悔。

我因承担的是民国史的集体工作，因此，我的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以后逐次延伸到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间还同时担任了十年《近代史研究》的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困惑和难题，是前辈师长给了我勇气和信心，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他们的谆谆教诲，使我懂得了研究历史，一要从广泛搜集、认真辨析史料做起；二要依据真实的史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三要冷静、理性、全面思考问题，抵制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四要依据真实的历史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五要服从真理，对历史负责，随时准备修正缺少史实依据的新旧见解等等。而主持学术刊物，则一要关心学术信息；二要倡导优良学风；三要不徇私情，严格用稿制度；四要据实论史，不以猎奇求胜；五要“英雄不问出处”，唯以来稿质量为准；六要坚持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七要积极培养学术新人等等。我不敢说真正吃透了前辈师长教我的精髓，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只能说是追求了，努力了，实践了。至于是否不折不扣照办了？效果如何？能打多少分？那要由真正的裁判读者说了算。

本书所选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讲政党、社团，计6篇；第二组讲人物，计11篇；第三组讲史事，计8篇；第四组是评论，计12篇。其

中第二组有两篇分别是与国家图书馆李希泌研究馆员及本所徐辉琪、王学庄研究员合作完成的。李先生已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仙逝，谨在此表示我的深深怀念，并由衷感谢徐、王二位先生的精诚合作。书中有个别篇章，为照顾内容的完整，稍有重复。各组文章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原载报刊、论文集及时间注于篇末。对注释标注，未作统一处理，基本维持不尽一致的各原载报刊的标注方式。对篇名和内容，除个别因发表时有所更改和删节，或属明显的史实失误，予以适当恢复和改正外，其余各文即使今天明知有修改余地或必要，也一仍其旧，以便于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金以林研究员，周斌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徐思彦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谨致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真诚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2010 年 8 月 5 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 目录 | *Contents*

自序	(1)
----------	-----

政党、社团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3)
民国初年的自由党	(25)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28)
民国初年的民主党	(33)
民国初年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	(52)
略论日伪新民会	(77)

人 物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正	(93)
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	(97)
蔡锷与“二次革命”	(114)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真义何在？	
.....	(137)
朱执信在护国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	(141)

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	(147)
刘显世与护国战争	(155)
蔡锷与《清议报》	(169)
蒋介石 1929 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181)
蔡锷与国际公法	(211)
蔡锷与小凤仙	
——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	(228)

史 事

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	(281)
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述评	(298)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309)
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	(320)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337)
中国人民对韩国“三一”运动的支持和声援	(384)
论 1928 年的东北易帜	(392)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	
——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	(437)

评 论

《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读后感	(471)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475)
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	(480)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	(483)
“文抄公”惯用的手段	(487)
新年寄语	(489)
评“192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493)

抗日战争研究不能以偏纠偏	(508)
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 ——读《中国近代通史》有感	(512)
《近代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	(519)
《追远录——纪念万福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序	(553)
《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 辨析》序	(556)
附 录	
无怨无悔的岁月	(561)



政党、社团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1911年11月5日，一个号称倡导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依古以来，一切团体公然自承认为党者之破天荒”。^①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解剖一下它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一 江亢虎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党，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江亢虎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883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江澍昀是光绪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江德宣是光绪十二年进士，任工部主事。他自己也做过刑部主事。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江亢虎明明是职官，却提倡社会主义，太奇！”^②

说奇也不奇，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江亢虎青少年时代的思想特点，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转变的奥妙所在。江亢虎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麦秀之歌作于宫廷，瓜分之惨悬于眉睫”的时代。^③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他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惕然而自

① 《天铎报》1912年3月13日。

② 《时评二十则》，《社会星》第3号。

③ 《江亢虎文存初编》，1944年1月版，第1页。

危，蹶然而思奋”。^①因此，还在“胜衣就傅之年”，他就表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当读《大学》至“治国平天下”时，他曾问老师“天下何以不曰治，而曰平？又‘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国家可均也’，亦请其意义”，但老师却“均无以应”，使他“怀疑既久，触悟亦多”。后来，他读到《礼运篇》，知道世界有小康大同之别，于是“慨然慕大同之治，妄草议案，条例多端，以为必如何如何而后天下可企于均平，因虚拟一理想世界，如佛陀、耶稣所谓天国者也”。^②所不同的只是宗教家“希望天国于既死之后”，而江亢虎是要“建设天国于有生之时”，而且宗教家是“自精神方面想入”；而他则“自物质方面想入”。^③戊戌变法时期，他开始接触“新学”，并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影响。^④

1901年春，在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热潮中，江亢虎也怀着“广求智识，备将来对国家靖献之资”的目的，踏上了赴日的航船。^⑤但这次留日仅仅半年，即“奉调”回国，受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然而不到一年，又因“年少气盛，不习与诸官僚往还”而辞职^⑥，再次赴日留学，至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运动日益活跃的时期。1901年，片山潜领导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组织的平民社也宣告成立。江亢虎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均有所接触，而且围绕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进行过某些讨论。

两次留日是江亢虎思想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里，他把初步接触到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儒家大同思想作了对比，以为两者多有“互相印证之妙”，只是由于“当时此主义尚未发达完善，彼都人士，尤罕能道其梗概，故虽心有所见，亦不敢妄以示人”。^⑦

五年之后，即1910年3月，江亢虎在“南洋大臣江西抚院酬给补助官

^①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1913年9月1日版，第16页。

^③ 《洪水集》，第16页。

^④ 从江亢虎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提出“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之说”，可知他是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影响的，因为“无国家”、“无家庭”（康有为作“无家族”）正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的重要内容。

^⑤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83页。

^⑥ 《洪水集》，第69页。

^⑦ 《洪水集》，第16页。

费”的支持下，又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他先至日本，然后周游了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1911年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历时整整一年。出发之先，他曾发表《环游留别词》，表明其目的在“广求世界的知识，致力世界的事业”，以“使中国为世界的国家，吾人为世界的人物”。他事后解释这次环球之游时说：本为“倡言社会主义”，只因当时处在清朝专制统治下，无言论自由，“故恒以大同主义、世界观念等名词代用之”。^①通过这次考察，江亢虎感到：1. 各国社会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与他昔日根据儒家大同思想虚拟的“理想世界”颇为相似。正如他自己所说：“比环游地球，观欧美社会党之盛况，凡余向所以为如何如何者，乃不期而暗合十之八九”。^② 2. 社会主义已成“二十世纪最流行之主义”，“其学说之弘通，势力之扶植，日进千里，风靡全球。在学界已成一极有根据之学科，在政界已成一极有声援之政党，地无论东洋西洋，国无论君主民主，罔不有其如火如荼之历史”。^③ 而中国又“门户洞开，舟车灵便，欧美政学界之一颦一笑，工商界之一针一缕，罔不与东方大陆有消息之相关”。^④ 因此，谁要把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隔离开来都是徒劳的。3. 对于社会主义只能因势利导，“使归正轨，把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仿佛大禹导洪水疏九河，用疏导的方法，可以流入于海”^⑤。相反，压制是行不通的，“压制愈甚，则爆发愈烈”，如“英、美、德、法之社会党，放任自由，而宁谧无迕；而俄、日、意、西之社会党，干涉严重”，则“祸变相寻”。^⑥ 4.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鼓吹必更易，赞同必更多，推行必更速”，因为中国不像欧美那样“多大地主大资本家”，而是“外患内忧，民穷财尽，上而朝廷，下而阑阙，无人无日不在经济困难之中，即贵官富豪，向之养尊处优，挥霍如意者，今亦点金乏术，仰屋兴嗟矣！故不独工商界独蒙影响已也”^⑦。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慨叹“人心一致，斯道不孤”的同时，一种“天民先觉，舍我其谁”的“狂妄之责任观念”便蹶然而生^⑧，从而最终形

^① 《洪水集》，第1~2页。

^② 《洪水集》，第16页。

^③ 《社会星》第1号。

^④ 《洪水集》，第44页。

^⑤ 《江亢虎演讲录》，1923年6月版，第81~82页。

^⑥ 《江亢虎致袁世凯书》（1912年5月），《社会世界》第2期。

^⑦ 《洪水集》，第17~18页。

^⑧ 《洪水集》，第16页。

成了他的所谓“社会主义”信仰。以上事实说明，江亢虎所以提倡社会主义，一是有感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不可阻挡；二是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上而朝廷，下而阙阙”皆能“赞同”的所谓“正轨”。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着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早在留学日本时，他就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①，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三无主义之说”。1910年7月，他在《无家庭主义意见书》中，历举有家庭则无真亲爱、真自由、真平等三大害，认为“欲求亲爱、自由、平等等快乐者，必先破家庭”。1911年环游回国后，他又发表《个人》一文，认为个人是“世界之原分子”，“世界由单纯个人直接构成”，国家、家庭、民族、宗教团等等皆不应成为“世界与个人直接关系之中梗”，极力宣扬“近世个人主义”，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②稍后，他还公开承认：“余所倡导之个人主义，即余所倡导之社会主义”。^③这些事实说明，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正是否定国家、否定家庭、追求个人的所谓“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绝对亲爱”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十分自负地说：“无政府主义之入中国，余亦为其介绍人之一人”。^④

但是，江亢虎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首先，他并不笼统地否定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说：“唯所主张则以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为度，而未尝倡言无政治”。他认为政治本有两种性质，“一种曰‘国家政治’，一称‘官治’，如军备、赋税、刑罚等是。此实政治罪恶之泉源也。宜用消极主义，俾日即于简单；一种曰‘人民政治’，一称‘自治’，如教育、实业、交通等是。此实政治万能之枢纽也。宜用积极主义，俾日臻于繁备。设必一切扫而空之，试问将来成何景象！若更有组织，则即仍有机关，亦即仍有政治矣；若更无组织，则人类能否生存，社会能否进化，无论谁何，不能下圆满之答案也。故就目的而言，余取有机的”。^⑤这说明江亢虎并非无条件地否定一切政治，他所否定的只是“官僚政治”，或者说“强权政治”；而对于“人民政治”，或者说“自治政治”，非但不否定，而且主张其

^① 《洪水集》，第36页。

^② 《社会星》第1号。

^③ 《洪水集》，第31页。

^④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4页。

^⑤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4页。

“日臻于繁备”。所以，江亢虎又承认他“断然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①

其次，在方法手段上，江亢虎也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余则大不赞成。”^②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平和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若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者也”。^③唯一正当的方法是“普遍鼓吹，取得大多数之同意，以一致进行。”^④这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江亢虎的所谓“社会主义意见”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他说：“余个人对于社会主义之意见，亦可括以三言，曰教育公共，曰营业自由，曰财产独立”。又说：“余所谓教育公共者，自初生至成人，无贫富贵贱，同在公共社会中，受一致之教育。如此则智识平等，智识平等则能力平等，而经济自平等矣。所谓营业自由者，一届责任年龄，即使各谋生计，人竭其才，自求多福。如此则贤者可以绝尘高步，不肖者亦不敢游手好闲，而义务权利调剂得宜矣。所谓财产独立者，财产必由自力得来，其支配权即以有生时期为限，虽父子兄弟夫妇，界画较然，不相嬗迭，死后一律充公。社会公共事业，如教育等费，即取资焉。如此则依赖之劣根性除，而世袭遗产之恶制度绝矣。其始虽仍有贫富贵贱不平等之现象，然教育既一致矣，三五世而后，人之聪明才力，当必不甚悬绝，虽所学各异，所操亦殊，而此为分业问题，非复阶级问题。且聪明才力既略相似，又各无所凭依，而享受有丰俭者，必其用力有勤惰耳。菀枯荣辱，听人自为，此正天然之劝惩也。故愚意社会主义实行第一步，积极则建设公共教育机关，消极则破坏世袭遗产制度”。^⑤这就是江亢虎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后来发起的中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党党旗上的两个口号——“遗产归公”、“教育平等”^⑥——即由此而来。由此可见，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第一反对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第二

^①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8页。

^②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4页。

^③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社会星》第3号。

^④ 《洪水集》，第82页。

^⑤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记》，《社会星》第2号。

^⑥ 《中国社会党发起支部规约》，《社会》第4期。

不要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第三无须消灭阶级^①。他认为只要人人都在成人之前“受一致之教育”，成人之后“各谋生计”，不受供养，也不供养于人，而死后又实行遗产归公，不给子孙继承，社会主义的“极乐世界”就会平平安安地到来。这种思想正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

江亢虎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这种二重性特点，对中国社会党的影响很大，不仅规定了它的纲领和路线，而且直接导致了它内部的斗争和分裂。

二 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和初期活动

1911年春，江亢虎环游回国后，即已立志“倡道社会主义”。但在当时清朝专制统治下，他没有勇气“倡言社会党”，只好采取“称名异而取义同”的办法，代之以“个人会”。6月1日，他赴杭州惠兴女学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②这是他在国内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公开演讲。据他说这也是“中国有社会主义演说之始”。^③江的演讲当时本“无人注意”，但由于杭州某巨绅欲借此“推倒其私仇”，浙江巡抚增韫为取媚此绅，于是派员“查办江亢虎”，最后以“驱逐出境”了事。经此一查一逐，江亢虎声名因而大噪。7月10日，他避居上海后，即借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称，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④，当场签名入会者50余人。这就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10月10日，以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为目标的武昌起义猝然爆发。11月3日，上海也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宣布独立。在这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江亢虎感到再没有必要顾虑清政府的干涉了。于是，11月5日，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并宣布由他一手

^① 江亢虎虽然也说消灭“阶级”，但其含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阶级”有本质区别。他所说的“阶级”，不过是“贫富”、“贵贱”、“智愚”、“贤与不肖”的差别，并不是指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为标准划分的“阶级”。

^② 《时评二十则》，《社会星》第3号。

^③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2页。

^④ 《社会星》第2号。